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范式

——为《实践论》问世80周年而作

□ 任 平

苏州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3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 方法论自觉的逻辑装置

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曾说：思想史都将经历两次，一次是自在的历史，另一次则是对自在历史的自觉反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史，也同样经历从自在探索走向自觉反思的历程。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下简称“中国化”）正在进入对以往道路反思的方法论自觉，演变成为一种方法论装置的研究范式。从“中国化”的百余年史看，学界由于对“中国化”含义的理解迥异，因而，方法论自觉的反思意义和出场方式也就不同。对“中国化”差异性理解主要表现为下列五种观点。

第一种，“中国化”意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的传播和应用。因此，自马克思主义被翻译为中文、在中国大地上传播起，特别是被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用来唤醒民众、研究中国问题起，我们就开始了“中国化”。

第二种，“中国化”意味着“中国话”进而“大众话”。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著作、文本、思想、原则“说中国话”，“中国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从外国语变成中国气派、民族语言的中国话语，进而变成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大众话语，因而让中国大众读者听得懂、看得懂、好掌握。在方法论研究范式上，这一主张者致力于“中国话语”研究和“通俗化”表达范式创新。

第三种，“中国化”意味着“聚焦中国问题反思”，得出关于中国问题的结论。“中国化”作为有的放矢过程，强调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之矢射中国问题之的，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实际相结合，这肯定是对的。在方法论研究范式上，这一见解主张者强调“反思的问题学”导向，认为“中国化”成功与否的秘密全在于能否发现不同于外国的中国独特问题。解决了这一问题，“中国化”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中国问题导向固然

非常必要，以研究中国改革发展稳定重大理论和实践的真问题必须成为主攻方向，但“中国化”仅此却是不够的。

第四种，“中国化”等于原创“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关于中国话语已有论述，这里不再重述。在方法论研究范式上，主要致力于理论出场形态学研究：创造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唯物史观理论，等等。原创中国理论、中国话语当然是中国化的最重要目标之一。

第五种，“中国化”等于儒家化、道家化、佛家化。以传统中国某一道统思想来化马克思主义，使之成为新儒学、新道学、新佛学，完全抹杀马克思主义文化本性与上述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区别。在方法论价值观上，表现为文化保守主义。在“中国化”进程中，要坚持文化路径，全面继承弘扬包括中国优秀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秉持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文化态度，非此不可能有真正的“中国化”。

由此可见，作为方法论自觉形态的研究范式，决不能偏爱某一方面而致使总体偏颇。基于这样的判断，那么进一步的问题就必然提出：如何使研究范式在方法论自觉意义上全面而准确地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纲领？集《实践论》发表至今80年来的“中国化”实践道路的经验，这一方法论自觉的研究范式的内容，包含有两大系列要素。第一系列是实践路径、理论形态形成的方法论自觉系列。它经历一系列环节，这些环节构成一个整体的逻辑系统。也就是说，创造理论形态的研究范式是一个系统，由相关的环节组成。这些环节即是：基于实践第一聚焦中国问题；坚守中国解答的民族立场；形成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凝聚中国研究视域；原创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阐述中国风格的话语方式。这六个环节依次而为，构成一个整体，进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范式。第二系列则是文化路径、文化形态形成系列，也包括若干环节；秉持中国文化自信和文

化态度;深刻把握理论接受的文化前理解结构;全面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创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形态。

二、理论形态:研究范式的第一系列型塑

从“中国化”实践路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实践结合)和理论形态的第一系列型塑逻辑来看,基于实践第一的观点,聚焦中国问题,成为研究范式的第一重要环节。《实践论》真正奠定了“中国化”起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遭遇一个笔者称为“康德式分裂”的尴尬。

坚守中国解答的民族立场或中国人民立场,是研究范式的第二个重要环节。问题导向是中国化研究范式的对象引导环节,有的放矢,射箭须对准靶子是研究的基本逻辑。然而,聚焦中国问题还需要有正确的立场加以研究。

站在中国人民立场上,经过实践路径和问题反思而形成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成为“中国化”研究范式第一系列型塑的第三环节。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具有直接性、感性和具体化的特点,然而这是所有理论形成最为重要的经验基础。

凝聚中国研究视域是起于中国问题、坚守中国立场到走向中国理论之间的第四个必要逻辑环节。视域通常是指一种凝聚的世界观即观视世界的方式,仿佛是按照一定的向度打开的叙事空间,带有核心概念和价值的方法论图景,是构成抽象的、理性的理论的必要内核、知识前提。它的作用就像盐池中的种子结晶体,迅速成为催化盐水结晶聚集的核心。我们的“中国化”问题意识、中国立场可能是直观的、朴素的,因而还不能直接成为理论。要使问题意识、坚定立场转化为一种理性的、抽象的理论,就必须要在一个世界观、方法论和核心概念的催生下形成。哲学是系统化的世界观的理论体系,没有了一定的理论世界观,也就不可能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视域不同,同样的问题意识和立场就可能被加工为不同形态的理论。因此,我们重视视域在“中国化”研究范式系统中的重要作用,原因也在于此。因而,我们反对经验主义的思维短路,认为中国问题、中国立场、中国经验可以不经一个可靠的视域直接上升为理论。

构建中国理论是“中国化”研究范式的主要创新目标之一,也是其系统的第五个关键环节。在问题反思和实践探索中形成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需要经过视域核心的催化才能上升为抽象概念和原则。聚焦和解答中国问题得来的各个概念、经验、范畴、判断、推理、原则、规律、法则等等思维成果,都不能长期处在散漫无机的碎片化状态,而需要在立场

支撑、视域支持下凝聚起来,按照一个逻辑框架,变成一个逻辑自洽、条理分明、理性完备的学科化、系统化的理论系统。理论概括需要来自新鲜的中国内容,也需要学科化的框架、体系、逻辑形式对这些内容加以整理、定型,成为一个理论系统和知识系统。定型化、完善化的中国理论是在一点一滴的中国智慧创造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也是在反思继承相关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基础上提炼和转换的产物。中国革命和发展道路所内在体现的中国唯物史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都是构建中国理论的最为重大的部分。

创造中国话语是“中国化”研究范式第一系列型塑的完成形态。中国原创理论的话语形式必然是中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话语的资源是多样的,主要有中国五千年文明所形成的优秀思想和话语资源,有中国大众的日用日新的话语创造,也有对国外各种有益思想和话语的本土化再造,更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形成的话语创新。中国五千年文明也是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之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应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继承者。因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仅要继承、批判地使用诸如实事求是、仁爱、和合、诚信、知行合一、天人合一等等各个概念性、命题性、范畴性话语,而且要整体性地、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优秀话语基因,促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三、文化路径与文化形态:研究范式的第二系列型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不仅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实践路径,同时也有与中国优秀文化结合的文化路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仅具有真理形态,更具有为中国人民服务的价值形态和基于民族文化的文化形态。因而,作为研究范式,不仅要促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真理形态的建构,更要催生其价值形态和文化形态的形成。这就需要第二系列型塑。

站在文化形态建构自觉与自信的制高点上来反思“中国化”研究范式,需要把握以下几个重要环节。

第一个环节是秉持中国文化自信的文化态度,这是《实践论》深刻总结以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经验教训得出的第一结论。没有中国文化自信的文化态度,就不能彻底摆脱对洋文化的教条主义依赖,从中国实践出发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无从谈起。

第二个环节,深刻把握“中国化”文化接受前理解的基础。浸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众和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是因为本土文化与外来马克思

主义在精神上有贯通性、一致性。跨文化场的对译和转换,需要有深层的文化结构一致性作为基础支撑。作为外来文化,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所以被中国大众和知识分子接受,除了实践需要这一原因之外,还有与中国文化在本然性上一致性、贯通性的文化前理解特质有关。两种文化都具有对人类美好理想社会的价值追求这一向度。

第三个环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应该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主体继承者和整体继承者。所谓主体继承者,就是指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道统的衣钵传人不是新儒学、新道学、新佛学,而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只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才继承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有价值的民族精神、合理思想,光大其“道统”。

第四个环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应当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文化形态。这一文化形态的思想资源当然是多样、多元的。既有中国传统文化,又有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更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个阶段形成的红色革命文化、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也有吸收当代外来文化、科技文化、人文文化和生态文化,等等。关键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仅要成为当代中国的科学真理形态,绝不是一种单纯客观的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或智慧论,或者仅仅是“本体论、认识论、逻辑学三位一体”的东西,更要成为有立场、有价值、有道德、有温度、有情怀、有修为的当代中国哲学的文化形态。相比国外马克思主义,秉承中国传统伦理和修养精神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境界更可能是一种文化境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既要有揭示世界本质和规律、把握人类发展大势的科学思想的真理体系,更要有为人民服务、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天下大同的价值抱负和文化情怀,有一种追求共产主义自由王国的终极信仰,一种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地藏菩萨所说的“地狱不空绝不成佛”那样自我牺牲的崇高境界。

四、“中国化”研究范式:两个系列型塑之间的关系及其启迪

第一个系列的型塑是第二个系列型塑的现实根基和存在论支撑。马克思主义首先是科学的思想体系,因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中国化的科学思想体系。在这一意义上说,方法论自觉意义上的“中国化”研究范式,其底蕴和根基当然首先需要能够形成科学思想的系列型塑,从实践第一的问题反思到立场选择,到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进而提升中国视域,最终上升为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形成一个由存在到思维、由感性到理性、由基础到形上的逻辑

跃升过程。遵循这一逻辑,就大致包含着“中国化”理论思维的内在结构。这一逻辑是对百余年“中国化”实践道路经验教训的总结,更是方法论自觉的反思。

第二个系列型塑构成第一个型塑的精神条件和指向意义。中国文化自信的文化态度构成“中国化”道路开辟的文化精神条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前理解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精神的内在一致性构成中国大众在文化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前提。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以后,只有广泛、全面、整体地吸收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遗产,才能与中国文化之脉相通并成为其主体继承者,也才能在文化身份上从西方文化转向中国文化,彻底解决文化间的断裂问题。最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只有成为文化形态,才能真正具有中国精神和中国气派。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精神和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中国特点,不仅仅是采用中国话语,更重要的是秉承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

作为方法论自觉意义的“中国化”研究范式,在上述两个系列型塑的相互缠绕、相互支撑中构成一个完整的思想范型。由此观之,启迪之一,就是不能把“中国化”归结为其中的某一个片段环节,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必须要在系统整体上把握作为研究范式的各个环节及其相互关联。脱离了系统整体的个别环节,对于“中国化”固然十分重要,但是绝不可能是完备的。作为方法论自觉意义上的研究范式,一定是在整体系统上对各个环节、要素的系统把握和整体操持。启迪之二,不能将“中国化”仅仅归结为实践路径和理论形态形成的型塑过程,而忽略、忘却文化路径、文化形态。可以说,“中国化”的最高境界、难点不在第一系列,而在第二系列。“中国化”的完善形态一定是作为第二系列存在的文化形态。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精神的个性化特色大多表现在第二系列。启迪之三,文化路径和文化形态需要有正确的文化态度。决不能持文化洋教条主义,全然否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文化态度,用马克思主义原理作为工具任意剪裁中国传统文化,使之成为碎片化的对象。我们需要整体继承其文化血脉和精神,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应当成为五千年中国文明的主体继承者。当然,更不能采取全盘照搬文化的原教旨主义态度,整体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等同于文化复古,对其没有任何批判和扬弃。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需要经过整体的创生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只有经过这样的文化变革和文化改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形态才能真正出场。

■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约10000字